

政治和谐的执政考量

——基于政党—国家—社会框架的分析

张雪梅 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雪梅（1971.10—）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法学博士。师从陈锡喜教授、孙力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哲学、伦理学。

作者自语：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道教龙虎圣地鹰潭，70年代末改革战鼓擂响之年开始求知之旅。从此后，转辗宁沪，往来南政间。哲学领进门，政治终学者。学而无往矣，终归哲学门。人生非学术，学术似人生。倚临太阳东起之滨，心望军旗升起之地。蓦然回首，三十年只身灯影，成就博士虚名，直指马列老太；二十年三尺讲台，躬求育人育己，不负学生所冀。戎装二十年，只习得笔纸豪情；妻母十余载，多是两地抒柔情。幸，遇恩师无数，学高身正，指点人生江山，引领学海破冰；叹，凭疏浅才智，学一隅万，纵有名师相随，恐难全尽人意！过程与结果，全在一念间；薄酒与盛宴，同为喜事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和谐的执政考量——基于政党—国家—社会框架的分析/张雪梅著.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90-4536-8

I. ①政… II. ①张…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1778号

国际互联网(Internet)地址:

<http://www.jxkjcs.com>

选题序号:ZK2012012

图书代码:B12004-101

政治和谐的执政考量——基于政党—国家—社会框架的分析

张雪梅 著

出版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蓼洲街2号附1号
邮编:330009 电话:(0791)86623491 86639342(传真)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2.5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90-4536-8
定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03—2012—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赣科版图书凡属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进程，和谐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追求。当然，要使其化为现实，特别是把握其中的规律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似乎与政治和社会和谐具有天生的排斥性。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在相当长时间的里，政治与社会和谐问题并没有被无产阶级政党纳入其主题词。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和谐的理论 and 实践开始迈入了新的历程。青年学者张雪梅这本书，把重心放在无产阶级政党追求政治和谐的执政考量上，应该说有新的视野，是非常有意义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直接谈到过和谐，这一思想包含在他们的解放的学说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在于其剥削和压迫，以及它导致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分裂，所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首先在于社会的和谐，在于消灭剥削和压迫，维护社会的平等和公正。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取得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和必然要求，进而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特别是在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和谐发展。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首先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讲的实际上就是从政治和谐入手去追求社会和谐。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展现的是这一逻辑，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翻身求解放展现的也是这一逻辑。不推翻三座大山，不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何能够使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走向现代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张雪梅在这本书中,仔细而又审慎地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和谐理念,努力展示了马恩对未来理想社会政治和谐的原则性制度设想,以及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和谐执政探索,这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政治以及社会和谐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该书将政治和谐置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历程中进行考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方面,作者关注政治和谐的工具理性和工具价值。和谐的社会靠和谐的制度安排、和谐的政治为之保障和提供支撑,这种保障和支撑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社会和谐所能够达到的水平。这体现的是政治和谐载体性的工具性价值。例如,作者对新时期社会利益分化及其政治诉求的分析,认为必须以政治和谐为基础,增进利益的共建共享,并且以政治和谐打造多元利益整合机制。例如,书中对财政民主的论述,认为财政民主是消解社会矛盾冲突的政治和谐重要手段,都是较新和较重要的阐释。

另一方面,从政治和谐的价值理性和自身价值来看,它还直接就是构成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在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对和谐社会所作的 28 个字的概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反映政治和谐的要素不仅赫然处于首要的位置,而且占据了主要的内容。这清楚地揭示,政治和谐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不可取代性,这是超越于工具价值的。例如,作者阐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与政治和谐的关系,认为其中存在不可或缺的平衡逻辑,并进一步勘查了政治和谐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进程中的体现,勾勒了政治和谐目标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路线。毫无疑问,这些分析都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并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新命题的研究是不容易的,有所不足和遗憾也是正常的,说明这一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想,只要能够从中受到并得到启发,有所收益,就是好事,就是贡献,也! 出这本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孙力

2012. 3. 上海

前 言

政治和谐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现代命题衍生的现代概念,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清晰地表明,政治和谐既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中西方思想家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与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浴血求索的革命理想目标。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和谐。人类文明兴衰,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政治现实,也充分证明不良政治铸成不和谐社会,优良政治造就和谐社会。因此,政治和谐具有重要的超越于其他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和谐的重要研究主导价值。

本书在前期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和谐视野下的政治和谐理念与执政探索的基础上,又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场景,以政党—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从当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执政理念创新、多元利益整合、社会矛盾消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等重大现实问题切入,将这些问题与政治和谐联系起来思考,力求为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高度和视野深度,为治国理政提供决策参考,同时希望进一步推进政治和谐理论研究,使之能够置身于火热的现实政治生活而获得更开放的思维、更深刻的内容。这是提升政治和谐研究深度价值的需要,更是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 者

2012年3月

目 录

导 论 穿越历史的政治和谐思想 /001

第一节 政治和谐思想的历史探微 /001

一、孕育于中国社会文明的政治和谐思想建构与变革 /001

二、生发于西方社会文明的政治和谐思想探索与评析 /010

第二节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和谐”概念的代表性界定 /017

第三节 政治和谐理性认识的思维向度 /021

第四节 执政视角下的政治和谐内涵、标准与价值 /025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和谐视野下的政治和谐理念与执政探索 /030

第一节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和谐追求 /03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和谐理性思维向度 /032

一、政治和谐的本质是阶级利益关系的和谐 /032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政治和谐的最高境界 /035

三、马恩对未来理想社会政治和谐的原则性制度设想 /038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早期政治和谐执政探索 /043

一、巴黎公社的政治和谐执政实验 /044

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和谐执政探索 /047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与政治和谐 /054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执政内涵 /054

第二节 基于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执政理念及制约要素 /057

一、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内的执政理念内涵 /058

二、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下影响执政理念的主要因素 /060

第三节 政治和谐视野下的执政理念发展 /069

一、执政思维提升：从革命对立思维到全面发展、和谐共赢 /069

二、执政重心调整：从政治代替经济到以民生为重，四位一体发展 /073

三、执政权力边界明晰：从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到以政党为核心，强国家强社会 /080

第三章 当下中国多元利益整合与政治和谐 /086

第一节 多元利益整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 /086

一、利益分化的客观必然 /086

二、利益分化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090

三、公平有效的利益整合是多元利益整合的关键 /092

第二节 政治和谐对利益整合的价值贡献 /094

一、以政治和谐树立并增进共建共享利益观 /095

二、以政治和谐打造多元利益整合机制 /097

第四章 新时期社会矛盾消解与政治和谐 /101

第一节 正确认识和消解新时期主要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着力点 /101

- 一、当下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矛盾及其性质特点 /101
- 二、正确处理和消解当前主要社会矛盾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110
- 第二节 当前社会矛盾凸现并加剧的主要原因——政治不和谐 /113
 - 一、体制不和谐——政治体制层面的静态透视 /114
 - 二、权力不和谐——政治权力角度的动态透视 /119
- 第三节 财政民主——政治和谐视野下消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公共权力制约机制 /125
 - 一、财政民主是保证权力阳光运行的关键环节与集中体现 /126
 - 二、突显人大财政权是强化财政民主的关键 /128
 - 三、人大财政权的民主化改革进路 /130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与政治和谐 /135

- 第一节 理想与制度的平衡——政治和谐内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逻辑 /135
 - 一、理想与制度的内在关系 /136
 - 二、平衡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进程中的体现 /139
- 第二节 稳定与突破的共进——政治和谐目标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路线 /142
 - 一、20世纪80年代：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两维成长 /143
 - 二、20世纪90年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维制度成长 /144
 - 三、十六大以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维制度成长 /146
- 第三节 求实与创新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的启示 /149
 - 一、只有实事求是的正义理想才能引领制度的健康成长 /149
 - 二、只有制度成长与理想共识相匹配才能有效消除理想与体制



的裂痕 /150

三、只有立足政治关系和谐基础进行顶层设计才能搭建理想实现的制度平台 /151

第六章 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与政治和谐 /153

第一节 当下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因素探析 /153

一、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思维的制约 /153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影响 /158

三、人口流动和交往方式变化的影响 /160

第二节 用政治和谐加强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63

一、用以人为本引领：从精英主义思维到理性妥协思维 /163

二、用公平正义推动：从管理到服务，再到平等服务 /166

三、用民主法治促进：从控制维稳到协商维稳 /169

附录：本课题已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及反响 /177

主要参考文献 /179

导 论 穿越历史的政治和谐思想

第一节 政治和谐思想的历史探微

解读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读懂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政治和谐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衍生概念,要研究清楚它似乎并不困难。不过,聚焦于“和谐”之上的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的伦理学、社会学研究背景,政治学科产生的滞后,以及“政治”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却又致使讲清楚什么是政治和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们就拂去尘埃,穿越历史,走向古人的智慧。

一、孕育于中国社会文明的政治和谐思想建构与变革

思想是概念产生的先机。在我国,作为“概念”的政治和谐始见于现代,但以“和合”文化为主导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可以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寻找大量政治和谐思想的活跃身影。从现有研究资料看,作为“思想”的政治和谐早在几千年前有政治思想文字可考的商朝就已经存在了。^①如殷王很注重从上帝、祖先、自身三者关系的协调中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虽然这三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但从政治角度看,刘泽华先生认为这三者是统一的。上帝和祖先庇佑殷王,殷王又借助上帝、祖先崇拜而强化自己的权力,强调

^① 关于“政治和谐”思想源头,也有学者从帝尧提出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1]页),以及帝舜希望的“八音克协,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2]页)的政治理想,表达出可溯源到原始社会后期之意(参见饶恒久:《太史伯政治“和同”论的源与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本研究则采纳刘泽华先生以政治思想文字可考为政治思想研究起点的标准,从商朝开始研究,详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权力的合法性,以此达到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所以到商朝晚期,帝、祖、王已合而为一。在卜辞中,对死去的王有时也称帝,如“帝丁”、“帝甲”、“文武帝”,或泛称“王帝”、“帝”、“下帝”。殷纣王自称“帝辛”。既然上帝与王同为帝,王就具有了人神结合的性质。所以在卜辞中,王又自称“余一人”,表示天下之大,四海之内,“余一人”为最高。^①

到西周末期,伯阳父在与郑桓公讨论周王室的命运时,运用比喻对比的手法,从哲学上的“和同”论引申出政治“和同”论,提出了他的政治和谐观。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最直观系统的政治和谐思想。伯阳父(甫)为周幽王时的太史,又称史伯。伯阳父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②“以他平他”就是指各种不同事物的配合与协调,“同”即事物的同一性。伯阳父认为,事物要和谐平衡发展,就应该使相对或相反的事物、因素、力量共处一体,相互对立又各自不相逾越,形成相反又相成的协同局面或协调状态,这就是“和”。单一的事物缺乏对立面的比较就不能知其优劣长短,就不能长久发展,因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如果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美味,只有一种材料就不能建造、制作任何东西。^③进而讲到政治,也应提倡“和”,“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④这里,史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和谐政治观,即只要像先王一样,善于发挥不同类事物的特长,使之“杂”处而产生丰富多样的事物;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之形成统一的有机和谐体;处理好“王者”与“兆民”、“万官”的经济利益关系,息养庶民,使各级官吏都能从政府的税收中得到适当的衣食用度,这样就能使天下和睦安乐、心思如一,达到“和之至”的最佳政治境界。从这个原理来看周王室,它必将灭亡,因为幽王反其道而行之,奉

① 此研究可参阅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② 《国语·郑语》。

③ 徐元诰的《国语集解》引俞樾之说,认为“讲”通“构”,乃合集之意。转引自饶恒久:《太史伯政治“和同”论的源与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④ 《国语·郑语》。

行“去和取同”的政治路线。

史伯之后,这种尚“和”去“同”的政治和谐理念不断得到重申。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522 年),乐官州鸠劝阻景王铸造巨型编钟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① 250 年后,齐国的晏婴直接运用史伯的政治和谐原理分析君主专制下的君臣关系,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关键原则:君臣应相“和”而非相“同”。晏婴认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② 也就是说,尽管国君大多都是英明的,但其决策、意见常常免不了有不正确、不周到之处。臣子的职责就是及时而真实地向国君提出参考的、批评的、修正的意见。这样才能及时而准确地纠正或调整国家的失误、偏差,保证政治的和谐平稳,民众也就不会感到社会不公正而生争斗之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州鸠的“和平”之说,还是晏子的“政平”之语,都同样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和谐的推崇、认识和判断。

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诸子百家纷驰其说,争相言“治”。在以道、儒、墨、法为代表的诸多政治和谐探讨中,其治国之道虽然各有长短,但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君主专制政治“和谐”所作的理论思考和政治设计,不同的只是思考侧重点及实现路径。道家认为,政治和谐就是法自然的无为而治,没有政治是最大的和谐,不干涉百姓事务,被百姓遗忘了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与道家的消极治世不同,儒家开辟了一条积极的政治和谐进路。以孔子为代表,认为人不应遁入自然,而应回到社会,用礼仁两手积极救治社会,一是建立一个贵贱有别、等级有分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二是为政以“和”,善于寻求处理政治关系的适度点,把矛盾对立的关系转化为和谐关系,这样才能使矛盾双方既得到节制,又得到适当的满足,宽猛相济,和而不同,最终达到政治和谐的境界。墨、法两家师出儒家,也持积极救世之道。不过,墨家讲和谐,则着重在“兼相爱”的互助精神;而法家讲和谐,着重在法制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呈现出

① [三国·吴]韦昭:《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7 页。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两种不同特点的政治和谐认识。

一是儒墨提倡的伦理型政治和谐。即把天下治乱看做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相信依靠圣人、明君的设计,能够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来,社会发展之道不在社会的自然演化中,而在尧、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心中。所谓“政者,正也”,政治的功能在化人,而非治人,更非治事。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人民丰衣足食,更重要的在于使民有美善的品性与行为,这样才甘于君臣贵贱有等的谐和秩序。伦理型政治和谐思想表达的是试图通过伦理世界的改变,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各种政治难题的观点,因而提升伦理精神,将复杂的社会纳入家族与宗法之中,把政治与历史伦理化,使整个社会结构被固定在人伦纲常的伦理框架中,把伦理问题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成为这种政治和谐思想的主要特点。

伦理型政治和谐提倡掌政者要以身作则,要注重德性修养,并对君主提出了标准和要求,这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疑对君主能起到一定的制约和督促作用,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是,无论是儒家礼仁共治的等级和谐,还是墨家兼爱交利的无差别和谐,都没有抓住政治和谐的根本,即权力的实施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根本对治,即便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专制的君主地位也不是仅靠道德来维系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君主实行专制的前提条件,撇开这个前提,光谈个人修养是不切实际的空论。因此,过于看重个人力量,而不是制度的力量,过于强调伦理关系的和谐,而不是政治关系和谐,这使得伦理型政治和谐理想一方面高远唯美,影响深远,如《春秋公羊传》“所传闻、所闻、所见”三阶段说、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规划、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构想、历代农民革命提出的“平等”、“平均”、“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禹笔下的“海上桃花源”、康与之所说的“西京山中”世外隐乡,李汝珍虚构的“君子国”,等等,莫不深受其影响。我国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三大理想社会蓝图,也都从古代“大同理想”这一代表性政治和谐设计方案中汲取了营养。^①但另一方面,伦理型政治和谐构思的唯美与现实的残酷,由于缺乏制度的架构而无法握手言欢,它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政治思想家,却疏于培养出一个成功的政治改进者。

^① 王越霞:《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及其当代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二是法家主张的法制型政治和谐。这种认识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不是个人内心道德修养，主张以严明法令、严刑重罚为治国要素，力求通过专用刑罚之械数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它没有儒家那样的以人民获得幸福生活为政治目的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直接以尊君为政治目的，通过立法来治民定国，通过运术来安臣驭臣，两者相辅以达成政治和谐。法制型政治和谐的贡献主要在法律制度，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因而现实性与实践性均强于伦理型政治和谐。可惜的是，法家的“法”，包括后来其思想的发展都没有突破以君为主体、以法为工具这一认识框架。虽有商鞅提出“壹刑”，内含近代法律平等原则，《管子》也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教君主要以身作则，可惜他们均未立制君之法。到韩非说法，只管臣民是否守法，而君主位居法律之上，则离“王在法下”的现代法治精神相距更远了。也正因如此，法家虽重视以法治国，但却只能归为“法制和谐”，而不能称之为“法治和谐”。法制型政治和谐观崇尚的仍然是君主政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它最大的实践业绩是开出了秦帝之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专制帝国。也正因为自李斯致用之后，它逐渐沦为实用之术，而理论上终止发展，所以秦汉之后，“虽间有法家之言，终不能预于显学之列，足与儒家相抗衡。专制政体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长成，乃旋即弃之不顾，使归于微弱，纵非泉食其母，亦似得鱼忘筌”。^① 不过，法家重法重刑的思想逐渐与儒家礼治结合，成为秦汉以后各国为寻求君、臣、民三个政治角色之间的协调关系以保君主专制统治的主流制度设计原则。

先秦盛况空前、睿智前瞻的政治和谐探讨，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秦后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谐追求。封建专制下的天下为公与小康之家、太平之世构想、井田制规划、世外桃源与君子国构想，近代中国出现的太平天国构想、大同社会构想，乃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想，无不深深地烙上了先秦政治和谐思想的印记。不过，到孙中山时，近代中国对政治和谐的追求已经从思想到实践开启了彻底摆脱以伦理治国，从伦理等级关系中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制定权力规则、控制权力行使的传统政治和谐模式的帷幕，开始引导中国

^① 语见《庄子》。转引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步入现代政治和谐模式的设计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和谐构想中。

第一,“争平等”是未来社会政治和谐的核心价值追求。“三民主义”的核心和精华是“争平等”。1924年孙中山曾在一次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说道:“简单言之,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区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诸君要详细研究。”^①这表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平等、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民族独立,即平等的第一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生存权,不做外国人的奴隶。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曾给“三民主义”下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定义:“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三民主义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②民权自由,即平等的实质是荡平不平的阶级,求得人民在政治上的平权。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③民生幸福,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同时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这里蕴涵了平等是避免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的深层含义。

第二,经济平等是实现政治和谐的关键。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要防止以后再发生革命,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不均这个重大课题,所以他十分重视民生。孙中山认为,“民生”二字早已有之,但把“民生”运用于政治经济则是他的发明。民国初年,孙中山明确定义他的民生主义是“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人民共享”,通过人民“共享”社会物产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3页。转引自崔敏:《试析孙中山的平等观》,《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

^② 《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③ 《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及利用物产所产生的成果,达到经济的平等,由是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富人以其富专制毒害贫民”,“防止资本家之专制”,最终进入“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① 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强调:“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② 在《三民主义》中他又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③ 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孙中山的经济利益平等是政治和谐的重要基础与核心价值这一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思了一个主观社会主义理想: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集种种物产归为公有;应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教育、就业、生老病养有保障;应使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平等、友爱的新型关系。^④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⑤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的性质与社会主义一样,二者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1)“目的是在打破资本主义”,用一种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2)实行“国有”、“公有”,“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3)社会分配采用“公平方法”,在实行“贫富相均”的基础上,达到“利国”、“福民”,人人平等。

为了实现上述构想,就要采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等方式。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逐渐达到土地国有,实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节制资本就是在节制私人大资本的同时,由国家兴办经营交通、矿产、工业等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孙中山认为,只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大同主义就指日可待了。后来他又将平均地权思想发展到耕者有其田的高度,以社会主义为依归。孙中山认为,“‘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因此凡提倡“国有”而顾及“民生”的社会制度,他都称之为“社会主义”,即“民生主

① 《孙中山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山日报》2006年5月25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95—19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36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523—524页。

⑤ 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